

## 從稅收看香港中產危機

過去一年，隨著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集資及經濟持續復甦，港人的生活水平相較前幾年，普遍有所好轉。「荷包」進帳多了，繳納的稅項便明顯增加。這從稅務局上周三公布上年度的整體稅收創新高，達一千五百五十一億港元，較前年度大幅增加一百零一億，可見一斑。然而，我們若細心閱讀各項稅收的數字，會發現「社會流動性」減弱，富者愈富、貧者愈貧、中產萎縮的趨勢。若這些趨勢持續，社會出現不穩局面的機會定必增加，當局宜倍加注意。

### 中產收入漸萎縮

受惠於股市暢旺，政府上年度股票印花稅的收入高達一百五十億元，較前年度的八十一億激增八成半；股票印花稅的收入亦帶動整體印花稅激增四成，達到二百五十一億元，前年度僅為一百七十八億。稅局預測本年度(零七至零八年度)，無論印花稅收入、及整體稅收，都會稍為下降。主要原因是股市交投將會放緩、以及預算案提出的多項稅務優惠建議，如削減薪俸稅得以落實。基於此，稅局估計整體印花稅收入會降至二百二十六億、整體稅收則回落到一千四百八十九億。

本港的稅收結構，一向倚重利得稅、薪俸稅和印花稅(包括物業、股票及租約印花稅)三大稅種。這三大稅種已高佔整體收入八成多。無論利得稅和薪俸稅，長期都集中在一群「打工貴族」和大藍籌的上市企業上。經濟一旦下滑，這群重要的「稅收捐獻人」又收入大損，稅收便肯定大降。擴闊稅基成為不少人士及政府的共同願望。我和公民黨在去年便建議政府研究開徵資產收益稅，以及在利得稅中引入溫和的累進成分，藉以增加稅收來源，穩定政府收入。

現時，在三百三十多萬的本地勞動人口中，僅三成七「打工仔」，即一百二十多萬人需要繳交薪俸稅。而六成一的薪俸稅來自交稅最多的十萬名「打工仔」。根據稅局上周公布的資料，年薪九十萬元以上的高薪一族，去年收入增加百分之六，而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獲公司派發大額花紅、認股權等；年薪在三十萬至六十萬元的中產一族，增幅為百分之三點五，收入源於工資增長。數據顯示，高薪一族的收入，增長持續高於包括中產人士的「打工仔」。我們若把稅局的最新數據和分析，聯同政府統計處在三月公布的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，一併分析，確可得出本港出現富者愈富、貧者愈貧，以及「M型社會」、中產收入萎縮的初步結論。

所謂「M型社會」，是日本研究社會學趨勢的大師大前研一在其著作《M型社會：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》提出的理論，意指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及市場營商的結構轉變之下，一部分中產階層攀上社會階梯、晉升富裕

階層，但更多中產階層因未能保持競爭力，被裁員、減薪而淪為中下階層，以致社會的財富出現 M 型分布。

### 貧富懸殊趨嚴重

統計處在三月公布的數字，顯示過去十年，月入少於一萬元的住戶，佔整體住戶比例，由二成四增至二成八；月入四萬元或以上的家庭比例，亦由一成五增至一成七。可是，月入介乎一萬至四萬元的家庭，則由六成一下跌至五成五。當時，已有研究本地社會、經濟及統計學的大學學者，指出低下階層及高收入階層的人數，有上升趨勢，顯示貧富懸殊更趨嚴重；而更令人憂心的是中產階層有向下流動、而非上移的趨向。這顯示資本主義發達地方，勞動者和「打工仔」面臨全球經濟、市場環境急速發展和競爭下，無奈地承受著轉變和打擊。

誠然，現今的經濟及市場結構已非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般簡單，通訊科技的發達，方便了資本在全球尋找出路，大大提升了營商渠道的可行性及複雜性，變相亦縮小了整個世界的距離；大學教育的普及，令大學生泛濫及身價不再，無論哪一社會階層，要像幾十年前般輕易向上流動、俗稱「上位」，在競爭力如此激烈的環境下，著實不容易。所以，全球各大城市，如紐約、倫敦等，都面臨所謂中產萎縮的難題。

統計處在年中，將公布最新零六年反映社會貧富的堅尼系數，屆時對本港貧富問題應會有更清晰的掌握。在此，我呼籲政府高層著實留意中產萎縮的趨勢，著手制定新的政策，提供協助。香港的中產人士，一向已承擔著交重稅，卻享有限社會福利的困難；若他們的處境沒有獲得改善，對社會的長遠穩定，必做成負面影響。